



粤籍华侨华人与 粤地对外关系史

YUEJIHUAQIAOHUAREN YU YUEDIDUIWAI GUANXISHI

高伟浓

万晓宏 向 军 王国强 钟剑峰◎著

粤籍华侨华人与粤地对外关系史

高伟浓

万晓宏 向 军 著

王国强 钟剑峰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粤籍华侨华人与粤地对外关系史/高伟浓等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5. 6

ISBN 7 - 80120 - 335 - 6

I. 粤… II. 高… III. ①华人—移民—研究—广东省

②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广东省 IV. D. 634. 3②D827.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7374 号

● 粤籍华侨华人与粤地对外关系史

著 者/高伟浓 万晓宏 向 军 王国强 钟剑峰

责任编辑/李莎莎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张/9.125 字数/230 千字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80120 - 335 - 6/K · 190

定 价/20.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 100029

编辑部: (010) 64443056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本书由暨南大学 211 工程资助出版

前 言

广东省是中国第一侨乡，更准确地说，是早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出国的华侨华人及其后裔人数最多的省份。改革开放以后，以不同形式、不同身份出国并旅居海外的中国公民不只来自广东一省，也不只来自中国沿海数省，而是来自全国各省市，且其中一些省市旅居海外的人数已超过同时期广东省旅居海外的人数。但是，当今天人们探讨自古至今形形色色的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的时候，都得承认，广东曾是海外炎黄子孙这一独特群体的第一来源地；广东曾引领过中国历史上一段颇为悲壮的移民流；广东曾因其海外侨民的众多而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窗口乃至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的策源地；广东也因此诞生过孙中山等一批来自被誉为“中国革命之母”的华侨群体的杰出精英；广东曾因海外人力资源的富足而被赋予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省份，因而也将成为中国大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省份之一……总之，研究广东历史，研究中国近代史，若离开了华侨华人，则万事无从谈起。大量海外华侨华人的存在，是中国的独特国情，更是广东的独特省情。

无疑，作为一个有悠久海外移民历史的省份，广东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对外关系的历史，而广东的对外关系史（或称粤地中外关系史）则是整体的中外关系史中颇具特色的一章。

中外关系史的学术史已上百年。经过前辈学者的艰苦开拓

与辛勤耕耘，成果卓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空前繁荣，中外关系史研究更是取得长足的进展。在研究领域上，中外关系史历来多局限于少数狭窄的领域，但现已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交往等几乎所有学科领域，原先诸领域的研究也趋于丰满厚实；在研究时段上，中外关系史原先偏重于古代，但今天已延伸到近代乃至现代；在研究空间上，中外关系史原来偏重于整体的“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现已出现细化的以区域的“中（某省某地）”作为其中一端的趋势。正是在这一点上，开拓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广阔前景。随着以中国作为一端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成果的逐渐饱和，以区域的“中”作为一端和以更具体的领域作为研究对象，将成为未来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路向。粤地中外关系史作为中（国）外关系史的组成部分，是极富内涵和意蕴的。这个内涵的重要源泉，便是广东籍华侨华人。以广东作为一端的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最显著特征是，历史上广东人民因各种原因出国频繁，来去相对自由，因而形成了近至周边国家和地区，远至欧美大陆的分布广泛的粤籍华侨华人群体。这个群体堪称粤地中外关系史的“流动载体”。相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缺乏个人形象的状况而言，粤地中外关系史则因为这个群体的存在而富有活力和生机，也富有特色。

广东的华侨华人史研究一直在全国占据较为领先的地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20 余年间，成果辈出。迄今已有粤籍华侨华人史的专著问世。中外关系史因有了华侨华人作为“流动载体”而丰富多彩。粤地中外关系史不可避免地要以华侨华人作为重要研究对象乃至主体；同时，粤地华侨史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粤地中外关系史。当然，两者在研究领域、对象、重点上都有明显的区别。一般来说，华侨华人史的主体是华侨华人，

包括作为群体的华侨华人和作为个体的某些具有华侨华人身份的人。华侨华人史的聚光灯无疑应集中在他们身上；中外关系史的主体应该是人的活动及其带来的后果与效应，这种后果与效应串连、反映着相关方面的“关系”。

中外关系史着力于平等地看待“中”与“外”两端某些导致双方联系的因素、效果和进程，同时将这种联系看作是与两端的“关系源”不可或缺、相互依存的整体，而其他背景、场面则围绕着这一整体架构而展现。就本书而言，中外关系史的两端是“广东”（粤）与某个外国、外地区、外民族（这里的“外”往往是多重组合的），等等。本书注意平等地看待两端的动力源与其所发散的效果。当然，由于中外关系史研究者本身视角上的原因，也由于材料密集度上的原因，中外关系史往往给人“中”重于“外”的感觉。

正是从上述立意出发，本书力图将粤地中外关系史与粤地华侨华人史研究的侧重点结合起来。要是这样做，就首先要研究创造了辉煌业绩，在粤地中外关系史中起桥梁作用的粤籍华侨华人群体。在这个群体中，突出研究那些起领袖作用或中坚作用，享有威望和声誉，创造出重大业绩和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

粤籍华侨华人的群体区分有不同的特点，但最大特点是方言群的区分，而方言群的区分与地域（籍）的区分基本上相吻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广府人、潮州人和客家人。实际上，这三大群体在粤地中外关系史上的活动和业绩表现出强烈的相对独立性。这已为史家所公认。因此，本书就顺从这一共识，按照广府、潮州和客家三大群体，分别研究粤籍华侨华人的活动、业绩和影响。诚然，这种区分也并非完美无缺。至少，它弱化了粤籍华侨华人作为整体的贡献和作用，也可能会带来评判标

准不一的倾向，对它们彼此之间的合力作用也评判不周等。这是在以后的研究中应予以注意的。

本书整体上分析了粤人移居海外的动因、过程、类型、规模以及流向等。粤人移居海外是中外历史发展、互动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时间上看，近代以前的粤人出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16 世纪以前、16 世纪至 18 世纪和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从移民类型上看，粤人移民可以分为华商型移民、政治型移民、文化型移民、海盗型移民、华工型移民和作为特殊群体的留学生移民，等等。从移入地来看，粤人先是移居东南亚等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再逐渐移居路途遥远的非洲、美洲、大洋洲和欧洲，到了近代，数量庞大的粤人已经生活在世界五大洲了。

本书按照粤地方言群（地域）分别阐述了海外广府人、海外潮州人和客家人在移民动因、流向、规模以及职业选择等方面粤籍海外移民的若干共性，但也分析了其各自的特性。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为侨居地，特别是东南亚的开发、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向侨居地人民展示并传播了带有浓厚地域性特征的中华文化，为侨居地的文化增添了异彩。同时，他们对中国，特别是对他们祖籍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倾心尽力，贡献良多。他们通过中外贸易、投资、汇款等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祖籍地经济的发展，通过捐款捐物、参加政治组织、参军参战、宣传鼓动等方式推动了中国近代政治与社会的进步，通过办学、建医院、捐款等方式促进了祖籍地文化教育、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他们作为粤地中外关系史上的“流动载体”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以群体（方言、地域）面貌出现的晚清客籍外交官们在维护中国主权、保护中国海外侨民的利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等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是晚清中国外交界和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亮点。

本书作为历史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与使用。前人在粤地中外关系史、粤籍华侨华人史方面，已经有一些可资借鉴的成果。本书首先注意全面收集前人的研究成果，分门别类，达数十种。同时，广泛搜猎与本项目相关的史料，系统地用于本项目的研究之中。本书虽不能说已经穷尽了现有的有关粤籍华侨华人的资料，但我们对使用这类资料的“枯竭感”是日渐强烈的。如欲对粤籍华侨华人研究的史料有一个可观的突破，向海外挖掘第一手材料，包括外文材料，似是最大的希望所在。我们亦期待着在这方面做进一步的努力。

本书原为高伟浓主持的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项目初稿完成后，由主持人重新做了结构调整和修改，从而形成现有框架。具体执笔情况如下：高伟浓负责项目框架的设计与调整，各章部分内容的撰写和统稿；王国强负责粤籍华侨华人海外移民史主体内容的撰写（第一部分）；万晓宏负责广府籍华侨华人主体内容的撰写（分属第二、三、四、五部分）；向军负责潮籍华侨华人主体内容的撰写（分属第二、三、四、五部分以及第六部分）；钟剑峰负责客家华侨华人主体内容的撰写（第七部分）。应说明的是，考虑到各部分内容的相对独立性和有待完善补充，本书不采用通常的章节结构。

本书循学术界惯例，对未加入外国国籍的称之为“华侨”；对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称之为“华人”；一般情况下则使用“华侨华人”的概念。

本书错讹在所难免，当由作者负责，也诚望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谢！作者诚挚地期望本书对日后的粤籍华侨华人与粤地中外关系史研究有所裨益，并为此感到高兴。

目 录

一、粤籍华侨华人海外移民史概说	(1)
(一) 广东的自然人文环境及其对外关系的发展	(1)
(二) 散见于史籍的粤籍海外移民及其分布 (公元 1500 年以前)	(7)
(三) 散见于史籍的粤籍海外移民及其分布 (1500 至 1840 年)	(11)
(四) 近代粤籍海外移民	(21)
二、从广府、潮籍海外移民看粤籍华侨的移民方式与分布	(59)
(一) 广府籍人海外移民史概观	(59)
(二) 潮籍人海外移民史概观	(88)
三、粤籍华侨华人对居住国发展的贡献一瞥	(108)
(一) 广府籍华侨对居住国发展的贡献	(110)
(二) 海外潮人对侨居地做出贡献的若干领域	(118)
四、海外粤籍华侨对中国政治与社会进步的贡献概略 ..	(124)
(一) 广府籍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	(125)
(二) 潮籍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	(137)
五、粤籍华侨华人对家乡经济建设和社会公益 事业的贡献综述	(149)
(一) 广府籍华侨华人	(151)

(二) 潮籍华侨华人·····	(158)
六、海外粤籍华侨华人与中外文化交流管窥 ·····	(188)
(一) 语言文字·····	(190)
(二) 科学技术·····	(197)
(三) 潮剧·····	(198)
(四) 谜艺·····	(208)
(五) 宗教·····	(211)
(六) 潮菜·····	(215)
七、以方言地域为基础的“帮文化”与海外粤籍人 群体的活动 ·····	(220)
(一) 晚清客籍外交官群体兴起的背景与原因·····	(223)
(二) 从外交活动看晚清客籍外交官群体·····	(245)

一、粤籍华侨华人海外移民史概说

(一) 广东的自然人文环境及其对外关系的发展

1. 广东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广东省位于中国大陆南部，简称粤。北依南岭，与江西、湖南相连；南濒热带海洋，西南隔琼州海峡与海南岛相望；东界福建省；西同广西壮族自治区为邻。全省陆地处于北纬 $20^{\circ}9' - 25^{\circ}31'$ ，东经 $149^{\circ}45' - 117^{\circ}21'$ ，北回归线横贯境内。海岸线曲折，大陆海岸线长 3368.1 公里，境内海面辽阔，因而在历史上海外贸易发达，海外移民众多，历史久远，奠定了粤籍移民遍布全球的基础。同时，自从秦统一中国后，广东乃至岭南地区就成为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陆路交通越来越畅通，广东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广东地区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重要纽带和窗口，广东的对外关系史也就成为中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在历史上辖域几经变化。其中最近一次最重大的变化是 1987 年海南岛从广东省划出，成为海南省。故这里所论述的粤籍华人，一般情况下不包括琼籍华人。

据 2002 年《广东年鉴》的统计：截至 2001 年，广东省总人口达到 7783.41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7%，为全国人口第三大

省。全省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438 人。^① 广东的语言状况比较复杂,除了少数民族语言和一些不知名的土语外,主要流行三种汉语方言:一是粤方言,又称广州方言、广府话、白话;二是以梅州话为代表的客家话;三是以潮州、汕头为代表的潮汕话。今天在海外的粤籍华人也主要讲这三种汉语方言。以下即以三大方言群为视角对粤籍海外华人的情况进行分析。

广东全省除汉族外,尚有黎、瑶、苗、壮、回、满、畲等少数民族。汉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99.41%,少数民族人口约占 0.59%。其中瑶族多分布于连南、连山和如原山区;壮族则集中于连山、怀集等县,风俗习惯已与汉族相似;畲族分布于粤东的凤凰、莲花、罗浮等山区。回族主要分布于广州市和肇庆市;满族主要分布在广州市。对于上述地区历史上的移民情况,迄今尚没有具体的研究。但可以肯定,历史上的粤籍移民当以汉民族为主体,上述少数民族海外移民人数肯定少之又少。

广东为全国华侨最多的省份,旅外华侨华人约有 2000 万人,遍布世界五大洲,侨居 174 个国家和地区,以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美国、加拿大居多,在港澳台同胞达 1000 万人左右。全省侨乡集中于:1. 珠江三角洲的“五邑”(台山、新会、江门、恩平、鹤山)、中山、东莞、宝安等县市;2. 潮汕平原;3. 粤东北的梅州、大埔、蕉岭、丰顺等县市。与上述三大汉语方言区大致重合。

广东商品性农业发展较早,工业基础较好,商业繁荣,但向来以农业为主。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经济结构发生显著改变,农业上大力发展以珠江三角洲为主的粮食、水果和甘蔗生产基地,开发雷州半岛的热带作物生产基地。工业建立了家用

^① 参见《广东年鉴》(2002 年),112 页。

电器、日用机械、纺织、食品、钢铁、机械、电力、化工、建材、电子等多种生产部门。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迅猛发展。1979年以来,深圳、珠海、汕头等地设立了经济特区,广州、湛江和珠江三角洲被列为开放城市或地区,全省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递增水平。广东的经济发展和进步,得益于广东自身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特别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海外粤籍乡亲的巨大支持。广大海外粤籍华侨华人除积极投资祖籍地的经济建设,通过捐赠等方式支持祖籍地的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外,还对沟通广东乃至全国与居留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 广东的开发及其对外关系发展

广东是中国文化发源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二三十万年前,就有“马坝人”(旧石器时代中期或晚期的古人)在韶关、曲江一带繁衍和生息。春秋战国时,广东为百越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发兵“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①。广东的大部分属南海郡,粤西肇庆一带属桂林郡,粤北连江一带属长沙郡,雷州半岛以南属象郡。秦将数十万人迁移到岭南三郡。这是最早从中国北方直接进入广东的移民群体。其时广东地区虽地广人稀,但战争与征服很可能导致当时“粤地”的原住民移民境外,但史无记载,今已不可考。

秦末,南海郡尉赵陀在广州自立为南越武帝,后汉高祖封之为南越王。西汉时广东人口已超过25万,普遍使用铁器,造船工场初具规模,陶器制作发展迅速,漆器可与长沙媲美,海上对外贸易亦已开始。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东汉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使节出使黄支（在今印度南部）的航线，“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汉之使者至此还也”^①。其时广州已成为全国较大的都市之一，南方犀角、象牙、翡翠、珠玕、葛布等均汇集于此北运。即司马迁所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玕、犀、玳瑁、果、布之凑”^②。这是官方的记载，但它折射出一个重要的事实：早在汉使黄支之前，民间的商人就开辟了广州到东南亚乃至更远的贸易航线，不排除一些粤地商人因在海外经商日久而滞留当地不归，成为“粤籍”移民。显然，如果没有民间开辟了这样一条定型的航路，官方的使节是不敢贸然前往的。

自三国分立到南北朝结束的 300 多年间，北方战乱纷繁，人口大量南迁，其中一部分进入广东。西亚和南亚一带的阿拉伯商人也乘船东来，以广州为据点，开展东西海上贸易。可以肯定，这时期粤地人民（特别是商人）出海更容易了，移民海外的途径也较以前更畅通了。

唐代建置岭南道，广东属之。唐开凿大庾岭道，使广东与北方联系加强。矿冶、纺织、陶瓷、造船等手工业大发展，商贾发达，人口猛增。天宝元年（742 年）人口达 93 万人。国外商人来粤贸易盛况空前。唐政府为了管理对外贸易，特在广州设立市舶使。据史料记载，广州其时贸易繁盛、商贾云集，“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有香药、珍宝，集载如山”^③。当时广州的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宗教文化交流更

① 《汉书·地理志》。

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 《唐大和上东征传》，转引自徐德志：《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29 页。

为活跃，光孝寺成为中印佛教交流的一个“亮点”^①，同时广州有大量侨居的阿拉伯人，这已为人所熟知。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人民又大量迁入广东。唐代晚期以降，经济中心逐渐南移，而西北由于陆上丝绸之路阻塞，海路贸易日渐重要，广东与外界的联系随之而有所加强。唐末，因避战乱，相继有人漂流到南洋各地谋生。此后，出国华侨遂被称为“唐人”。唐末战乱导致粤人移居海外，其数量应是巨大的。

宋代，岭南道改为广南道，后改道为路，继而又分为东、西两路。广东一名由此简化而成。宋代奖励农业，兴修水利。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筑堤围垦，使得经营范围不断扩大，粮食大增，广州始成一大米市，广南东、西两路大米云集于此，再经海路远销至闽、浙。北宋末年，北方受辽金之迫，人口再次大规模南迁，至南宋时更加显著，故广东客户甚多。现居住在粤东一带的客家，其祖辈多为宋代从北方移入者，逐渐成为汉民族中的一个独特群体。他们中一部分先民又移民海外，在海外再形成一个新的客家群体。宋朝继承了唐代实施的市舶使制度并使其制度化，在对外贸易上，制定了广州市舶条例，使中国古代的市舶使制度实现了制度化。广州是宋代设市舶使最早的一个港口，管辖范围包括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的一些港口，由此可见广东对外关系繁盛之一斑。

到元代，由于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的进一步开发及雷州半岛的屯垦，广东经济的重心遂由历来的粤北韶、连二州逐渐转向沿海。珠江三角洲蔗糖业甚为发展，蚕桑广布，人口密度开始超过粤北山区。元代广州港的地位虽为泉州所代替，但依

^① 参见罗香林：《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香港中国学社，1960年。

旧保持着繁荣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广东一些中小型港口的崛起，如粤东饶平的柘林港、潮州港等。港口的增多与繁盛无疑是海内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同时肯定也增大了粤地人民移居海外的趋势。粤地人民移居海外趋势的强化同时也就意味着广东在全国中外关系史中地位的强化。其实，自南宋以来，广东在全国中外关系史中的地位就依其海内外贸易与粤地人民移居海外趋势的强化而多方位地强化。

明代，珠江三角洲筑堤围垦颇有成效。佛山是全国闻名的制铁中心。潮汕平原吸引大批闽人前来开垦，潮州府人口随之大增。甘薯在明代由国外传入广东，耐旱高产，因而很快普遍种植。16世纪后，欧洲商人东来者渐多，率先者为葡萄牙人，继而有西班牙、荷兰和英、法等国。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以租借的名义强占澳门。虽然明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施较为严格的海禁制度，但纵观有明一代，通过广州或经由澳门，广东与外界的交往之活跃仍居全国之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西方势力已东来到东南亚各国并与中国发生了联系，这为广东的对外关系增加了新的因素，对广东乃至全国均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过去历代中外关系史是以“中”为主，多为单向的“中”对“外”，即使有少数“外”对“中”的关系发生，也多属周边国家和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朝贡”或“朝贡贸易”。西方势力的到来，标志着中外关系的多方位与较平衡的格局的出现，标示着近代中外关系以中西（欧）关系为主轴的时代的先声。而这种格局和先声，是在广东呈现端倪的。

清乾隆年间，广东经济全面发展，广州、惠州、潮州等地为制糖中心，所产蔗糖远销内地各省并输出南洋各国。佛山、汕头、琼州等地形成纺织业中心。全省人口随之大增，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人口达到2286万，跃居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省